



# 中国革命战争纪实

主编 侯树栋 范震江 刘统

土地革命战争

## 长征卷(下)

刘波 杜福增 等著

总策划：陈有和 郇中建 乔还田  
责任编辑：郇中建 侯春 王一禾  
冀良 张润生 崔继新  
整体设计：曹春  
责任校对：张彦

---

图书在版编目 (CIP)数据

刘波 杜福增 等著 —北京：人民出版社，2007.7

(中国革命战争纪实丛书 / 侯树栋 范震江 刘统 主编)

ISBN 978-7-01-005893-1

I.长... II.①刘...②杜... III.①二万五千里长征(1934~1936)—史料②二万五千里长征战役战斗—史料 IV.①K264.406 ②E297.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6) 第 124234 号

---

---

书 名 中国革命战争纪实·土地革命战争·长征卷  
ZHONGGUO GEMINGZHANZHENG JISHI  
TUDIGEMINGZHANZHENG CHANGZHENG JUAN

作 者 刘波 杜福增 等著

出版发行 人民出版社  
(北京朝阳门内大街 166 号 邮编 100706)

邮购地址 100706 北京朝阳门内大街 166 号人民东方图书销售中心

邮购电话 (010)65132886 65250042 65289539

印 刷 北京中科印刷有限公司印刷 新华书店经销

版 次 2006 年 10 月第 1 版 2007 年 7 月第 2 版第 2 次印刷

开 本 787 毫米×1092 毫米 1/16 印张 77.75 插页：12

字 数 1183 千字

印 数 0,001—5,000 册

书 号 ISBN 978-7-01-005893-1

定 价 194.00 元

---

# 第18章

## 逆流南下

张国焘倒打一耙——毛泽东惊人的预测——南下是没有出路的！——  
下达南下动员令——张国焘露出“庐山真面目”——张国焘的威信开始  
下降——逆境方显英雄本色——南下初战取胜——再战告捷——百丈失  
利——保卫金川

张国焘得知党中央和红一方面军1、3军单独北上的消息后，倒显得颇为冷静，并没有惊慌失措，好像早在其预料之中似的，或许张国焘需要的正是这种结果。

张国焘率部队到达刷金寺的当天下午，接到徐向前、陈昌浩的急电称：“一、三两军违抗总司令部暂停前进的命令，私自北进。”接着他们又来了好几个电报，其大意是：毛泽东因徐向前、陈昌浩率部已打开北进通道，左翼又为水所阻，不能再事等待而坐失良机，竟自动直接下令1、3两军，以“北上先遣队”名义，单独向北挺进。毛泽东等人此次行动，完全是秘密的，事先并未通知徐向前、陈昌浩等人。等到徐向前、陈昌浩发觉了这件事，1、3两军的殿后人员，才告诉他们这次行动是奉有中央的直接命令的。

张国焘则诬称毛泽东率党中央和红一方面军主力北上，是“悄悄溜走，再也不管其他大多数同志和军队”，并煞有介事地解释：“毛之所以这样做，

一是失败观念支配了他，二是宁肯我负人、不肯人负我的权谋思想在作怪。”

在若干年后，张国焘谈到这件事时，显出一副颇为大度的样子说：“我和一些负责同志冷静考虑之下，认为这样的分裂行动是不对的。红军各单位分开行动，中央随同任何一部分红军行动，虽是常有的事，但总该根据计划，顾到全局，而且对内不应守秘；尤其是在党内有歧见的时候，更不应这样做。如果毛泽东等人事先将单独北进的行动，告诉徐向前、陈昌浩或事先与总司令部商讨，他们绝不会受到阻拦，也许还可以得着较妥善的处理。如今毛泽东等人私撤防线，秘密北进，显然是不顾大局的自私行为。”<sup>①</sup>

很显然，张国焘是反守为攻，倒打一耙了！本来是他借故“噶曲河水阻”，下令左路军、右路军南下，此时，却将所有罪名都推到党中央和毛泽东身上。

1935年9月10日4时，张国焘以朱德、张国焘二人名义发电给林彪、聂荣臻等人并转中央领导人，对中央率红1、3军单独北进表示“不以为然”，随后很“豁达地”表示：红一、四方面军会合后又分离，党内无论有何讨论，绝不应这样。只要能团结一致，我们准备牺牲一切利益；红1、3军刚刚向前开进，如果遇到障碍仍请开回。不论北进南打，我们总要在—块儿，单独东进恐怕会被敌人所击破。

中共中央接到张国焘10日电报以后，于11日22时，在俄界再次致电张国焘，令其立即率左路军北上，并告知：“中央已决定右路军统归军委副主席周恩来同志指挥，并已令1、3军在罗达、俄界集中。”<sup>②</sup>张国焘接到中央的命令后，不仅拒不执行，反而对中央北上大加指责。9月12日10时，张国焘以亲笔信的方式致电红1、3军领导人并转中央，说什么“中央不图领导全部红军，竟率一部秘密出走，你们何以对国际和诸先烈”。最后反咬一口，道：“弟自信能以革命利益为前提，虽至最严重关头，只需事实上能

<sup>①</sup> 张国焘：《我的回忆》（第3册），现代史料编刊社1981年版，第267~268页。

<sup>②</sup> 中国人民解放军历史资料丛书编审委员会：《红军长征·文献》，解放军出版社1995年版，第679页。

团结对敌，无不乐从。你们为什么走到这一步，究竟是谁在制造分裂、反对团结，敬请明教。”

张国焘真不愧是历练多年的“领袖人物”，他这么一说，就将所有罪名都推到了中央头上。后来他在回忆录中称：中央这一“电报既未告诉我们今后行动的步骤，也未告诉我们北面一带的敌情，因而我们不能据以行动”。“根据我们当时所知道的情况，认为继续北进的时机已经失去，敌方已有足够时间派兵扼守甘南一带战略要地，北上几条要道中的一些险要桥梁，可能已为敌人破坏，因而拟定暂行南进的计划。我们电令各军事单位，做些准备工作和迷惑敌军的姿态。总司令部也就率所部向阿坝移动。”<sup>①</sup>

如果将张国焘的回忆录与其当时的所作所为相对照，就可以发现事态的性质完全不一样，这就是张国焘的双重面孔。

张国焘除了攻击党中央外，又将主要注意力集中到了随中央北上掌握军权的领导人身上。9月12日深夜，张国焘向红1、3军领导人发出电文，煽动红1、3军南下：“一、三军单独东出，将成无止境的逃跑，将来真会悔之无及。”“望速归来受徐、陈指挥，南下首先赤化四川，该省终是我们的根据地。”

张国焘在反对中央北上战略方针、分裂党和红军的道路上越走越远了。

为解决张国焘阴谋分裂红军所造成的危局，揭露和批判张国焘的错误主张，明确下一步的行动方针，中共中央政治局于9月12日在四川省俄界召开了紧急扩大会议。出席会议的有张闻天、博古、毛泽东、王稼祥、凯丰、刘少奇、邓发、叶剑英、林伯渠、李维汉、杨尚昆等21人。毛泽东在会上作了关于同张国焘的争论与目前行动方针的报告。

毛泽东点名批判了张国焘的右倾分裂主义，揭发了张国焘反党、分裂红军、反对北上抗日方针、退却逃跑和军阀主义等大量错误事实。他列举道：红一、四方面军在两河口会合，中央于6月18日做出决议，现在中央坚持

<sup>①</sup> 张国焘：《我的回忆》（第3册），现代史料编刊社1981年版，第269~270页。

这个方针，有同志反对这个方针，有他机会主义的方针，这方针的代表是张国焘，中央已经与他多次联系，但至今尚未达到，红四方面军起初是按兵不动，7月17日要集中第一地点未实现。张国焘到芦花，政治局决定他为总政委，张国焘才把红四方面军调动，但未到毛儿盖即动摇，一到毛儿盖又完全推翻这一决定，而把主力去阿坝、右路去班佑。张国焘到阿坝后，便不愿意北上，要右路军南下，政治局7个同志（包括徐向前、陈昌浩在内）在周副主席处开了一个非正式会议，决定令张国焘北上。<sup>①</sup>

会上，大家谈到中央再三地做过张国焘许多工作，想了许多办法防止他分裂，纠正其军阀主义倾向，但事与愿违。与会同志群情激奋，多数同志提出要给张国焘作组织结论，开除其党籍。但毛泽东力排众议，认为这样不妥，他解释道：“同张国焘的斗争，应采取党内斗争的方法处理。最后作组织结论是必要的，但现在还不要作，因为它关系到团结和争取整个四方面军的干部，也关系到一方面军在他那里的很多干部的安全。你开除他党籍，他还是统率几万军队，还蒙蔽着几万军队，以后就难以见面了。我们要尽可能地做工作，争取他北上。”听罢毛泽东的这番道理，与会领导们最后一致同意，暂时先不给张国焘作组织结论，并提议要在红1、3军中加强解释工作。

俄界会议正式做出了《关于张国焘同志的错误的决定》，认为张国焘的错误缘自他对于全国目前革命形势的发展，特别是对于全中国人民反日的民族革命运动的高涨估计不足，更对中央红军二万余里的长征中所取得的胜利估计不足，而夸大敌人的力量，轻视自己的力量，特别是红一方面军的战斗力，以至于丧失了抗日前线的中国西北部创造新苏区的信心，主张以向中国西南部的边陲地区（川、康、藏边）退却的方针，代替向中国西北部前进建立模范的抗日的苏维埃根据地的布尔什维克的方针。《决定》指出，张国焘这种机会主义的倾向，在胜利地粉碎了四川敌人对于通、南、巴苏区的进攻之后，自动放弃通、南、巴苏区时就已经开始形成。

<sup>①</sup> 中国工农红军第四方面军战史编辑委员会：《中国工农红军第四方面军战史资料选编》（长征时期），解放军出版社1992年版，第150页。

造成张国焘这种分裂红军的罪恶行为的，除了对于目前形势的机会主义估计外，就是他的军阀主义倾向。他在红军中保存着军阀军队中的打骂制度，以打骂的方式去凌驾地方党的、政权的与群众的组织，并造成红军与群众间的恶劣关系。此外，他以大汉族主义去对待弱小民族。“由于张国焘同志的机会主义与军阀主义的倾向，所以他对于党的中央，采取了绝对不可容许的态度。”他对于中央的耐心的说服、解释、劝告与诱导，不但表示完全的拒绝，而且自己组织反党的小团体，同中央进行公开的斗争，否认党的民主集中制的基本组织原则，漠视党的一切纪律，在群众前面任意破坏中央的威信。中央政治局认为：

张国焘同志在中国共产党内，犯过很多机会主义的错误，进行过不少派别的斗争。四中全会后一个短期内，他虽是对当时改造了的中央表示服从与忠实，但他对于自己过去的错误是并没有彻底了解的。因此在他远离中央，并在长时期内脱离中央的领导之后，又产生了新的机会主义与军阀主义的倾向。很明显的，张国焘同志这种倾向的发展与坚持，会使张国焘同志离开党。因此，政治局认为必须采取一切具体办法纠正张国焘同志的严重错误，并号召红四方面军中的全体忠实于共产党的同志团结在党中央的周围，同这种倾向做坚决的斗争，以巩固党与红军。<sup>①</sup>

中央出于与张国焘斗争的策略考虑，加之时间紧迫，俄界会议做出的《关于张国焘同志的错误的决定》只是原则通过。当党中央北上到达哈达铺以后，才由张闻天写成文件并获正式通过，但没有向下传达，直到1935年12月，才在中央委员范围内公布，并在红一方面军高级干部中口头传达。

俄界会议关于红军今后行动方针的报告强调，不管张国焘等人如何阻挠、破坏，中央仍然要坚持两河口会议上既定的北上战略方针。现在党中央

<sup>①</sup> 中国工农红军第四方面军战史编辑委员会：《中国工农红军第四方面军战史资料选编》（长征时期），解放军出版社1992年版，第153～154页。

只是率领红1、3军单独北上，力量是削弱了。从当前的敌我形势出发，行动方针应该有所变化，经过游击战争打通国际联系，以便得到国际的指示与帮助，整顿休养兵力，扩大队伍，首先在与苏联接近的地方创建一个根据地，将来向东发展，创建根据地。无论从地形上、敌情上看，只要我们党领导正确，加上克服困难的精神，实现这个方针无疑是可能的。

会议决定将原有部队缩编为中国工农红军陕甘支队，司令员为彭德怀、副司令员为林彪(兼红1军军长)、政委为毛泽东、政治部主任为王稼祥、政治部副主任为杨尚昆。

会后，毛泽东针对张国焘的问题、目前战略方针和组织上的问题等作了总结。他颇有预见地指出：对张国焘的斗争是两条路线的分歧，“是布尔什维克主义与军阀主义倾向的斗争”。“张国焘是发展着的军阀主义的倾向，将来可发展到叛变革命”。“目前战略方针，川陕甘计划是有变更，因一、四方面军已分开，张国焘南下，使中国革命受到相当严重损失，但我们并不是走向低落，而是走向大张旗鼓，游击战争打过去，更大规模、更大力量打过来。一省数省首先胜利，是不能否认的，现在如此，将来还是如此，不过不在江西，而是陕甘。”<sup>①</sup>

这番话不仅对中国革命的前途作了准确预见，而且对张国焘此后的人生轨迹作了超乎寻常的准确预测。从1935年10月12日起，到1938年4月初，还不到3年的时间，张国焘真的如毛泽东所预言的那样，投向了国民党的怀抱，当了可耻的叛徒（张国焘坚持率兵南下后，在卓木碉宣布另立“中央”。1936年6月被迫取消“第二中央”。同年7月任中共中央西北局书记。随后与红二、四方面军一起北上，10月到达陕北。1937年3月，中共中央在延安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批判他的分裂主义和军阀主义错误。为了教育和挽救他，同年9月仍派他担任陕甘宁边区政府副主席、代主席。1938年4月初，他乘去西安祭黄帝陵之机逃出陕甘宁边区，投靠国民党。4月18日被

<sup>①</sup> 中国工农红军第四方面军战史编辑委员会：《中国工农红军第四方面军战史资料选编》（长征时期），解放军出版社1992年版，第152页。

中共中央开除党籍。不久，加入国民党的特务组织——军事委员会调查统计局，主持“特种政治问题研究室”、“特种政治工作人员训练班”，从事反共特务活动。1941年起任国民参政会第二、第三、第四届参政员。抗日战争胜利后，一度出任国民党政府行政院善后救济总署江西分署署长。1948年6月在上海创办《创进》周刊，继续进行反共宣传。同年11月去台湾)。

俄界会议从实际出发，实事求是地分析了形势，及时地改变了战略行动方针，比较系统地指名批判了张国焘反对党中央、退却逃跑、军阀主义等大量错误事实，并指出了他犯右倾机会主义错误的历史根源，表明了党的原则立场。因此，俄界会议是红军长征途中的一次重要会议。

俄界会议后，中共中央率陕甘支队迅速北上了。根据俄界会议的精神，党中央对于张国焘的错误，仍然坚持党内斗争的方针。在严肃指出其错误的同时，希望他悬崖勒马，翻然悔悟。

9月14日，中共中央在北上途中不厌其烦地再次致电张国焘、徐向前、陈昌浩，要求取消南下的决心和命令，服从中央电令，具体部署左路军与红4军、30军继续北进，并严正申明：“一、四方面军目前行动不一致，而发生分离行动的危险的原因，是由于张总政委拒绝执行中央的战略方针，违抗中央的屡次调令与电令。”“一切外交的辞句，绝不能掩饰这一真理，更欺骗不了全党与共产国际。”为团结张国焘和广大红四方面军将士，电报还表示：“中央率领一、三军北上，只是为了实现自己的战略方针，并企图以自己的艰苦斗争，为左路军及右路军五、四军、三十军开辟道路，以便利于他们的北上。”

最后，电报高瞻远瞩地告诫张国焘：“张总政委不得中央的同意，私自把部队向对于红军极端危险的方向(阿坝及大、小金川)调走，是逃跑主义最实际的表现，是使红军陷于日益削弱，而没有战略出路的罪恶行动。”<sup>①</sup>

<sup>①</sup> 中国工农红军第四方面军战史编辑委员会：《中国工农红军第四方面军战史资料选编》（长征时期），解放军出版社1992年版，第155页。

张国焘此时早已将中央的命令与劝诫抛到了九霄云外，从噶曲河折回阿坝后，他便立刻大造反对党中央的舆论。对此，朱德总司令予以坚决的反对，便立即成了张国焘攻击的对象。由于党中央北上的行动是迫不得已而采取的秘密行动，加之对张国焘错误路线的批评没有在党内公开，广大左路军将士，特别是其中的红四方面军部队并不明了事情的真相。他们中的许多人在张国焘的煽动下，也纷纷指责中央，并向朱德等人发动围攻。张国焘先派人同朱德谈话，要朱德写反对中央北上方针的文章，遭到朱德的断然拒绝。

9月13日，张国焘又在阿坝格尔登寺大殿，召开川康省委及红军中党的活动分子会议。参加会议的有省委委员，还有工会、青年团、妇女部的一班干部，约100人。在这个会议上，张国焘把他与中央的争论公开化，公然举起了反对党中央的旗帜。会场外挂着“反对毛、周、张、博北上逃跑”的大横幅。张国焘主持会议并首先讲话，他攻击中央率1、3军北上“逃跑主义”，并鼓吹南下。接着，一些人跟着起哄，要朱德当众表态：“同毛泽东向北逃跑的错误划清界限”，“反对北上，拥护南下”。

会议的矛头直指中央，一些人的发言带着质问的口气：“北上“是右倾逃跑，是错误的！”“什么北上抗日，完全是逃跑主义！”会场上“帽子”满天飞。有的人甚至拍桌质问：“朱德同志，你必须同毛泽东向北逃跑的错误划清界限！”“你必须当众表示态度！反对毛泽东、周恩来他们北上抗日的决议！”<sup>①</sup>面对起哄、围攻，朱德从容镇定地坐在那里，不予理睬。

张国焘见此情景，开导似地说道：“总司令，你可以讲讲嘛，你对这个问题的认识怎样？是南下，是北上？”不料，朱德镇定自若地说：“中央决定北上抗日是正确的。现在日本帝国主义侵占了我国的东三省，我们红军在这民族危亡的关头，应该担当起抗日救国的重任。我是个共产党员，参加了中央的会议，举手赞成这一决定，我不能出尔反尔，反对中央的决定。我和毛泽东同志从井冈山会师以来就在一起，他挽救了党和红军的命运，我是完全

<sup>①</sup> 余洪远：《“南下是没有出路的！”——回忆敬爱的朱总司令》，出自《红旗飘飘》第21卷，中国青年出版社1981年版，第18页。

信得过他的。人家都叫‘朱毛，朱毛’，我朱德怎么能反毛泽东？遵义会议上确立了毛泽东同志在党和红军中的领导地位，我不能反对遵义会议的决定。”

他大义凛然地对张国焘说：“我再重复一下，中央北上抗日的决定是正确的，我绝不会反对。毛泽东同志我信得过，你可以把我劈成两半，但你绝对割不断我和毛泽东同志的关系！”<sup>①</sup>他反复讲北上抗日的重要性后，又讲遵义会议的伟大意义。他庄严地告诉大家：“南下是没有出路的！”

朱德的话刚说完，会场气氛又骤然紧张。有人冲着朱德喊：“既然你拥护北上，那你现在就走，快走！”对此，朱德一字一句地回答他们：“我是红军总司令，党中央和中革军委派我带领左路军北上。现在你们不执行中央、军委的命令，硬要南下，我只有跟着你们。你们到哪里，我也到哪里，我一定要执行党中央、军委交给我的任务，带领左路军北上。”

有些疯狂追随张国焘的人，故意歪曲朱老总的话，哄闹起来：“你说北上，又要南下，是个两面派！”“你既然要跟毛泽东退却逃跑，趁早滚蛋！”“撤掉他的总司令！”

坐在一边的刘伯承总参谋长再也看不下去了，站起来说：“你们是开党的会议，还是审案子，怎么能这样对待总司令？”这些人一听，气焰不得不有所收敛，随即又把矛头指向刘伯承，要他表明态度。刘伯承明确表示：拥护毛儿盖会议的决议，赞成北上。他以红军面临的形势说明，北上的必要和有利，指出南下不会有出路，最后还得北上。<sup>②</sup>

张国焘威逼朱德等人屈服、共同反对中央北上战略方针的企图没有得逞，但他所造的“声讨”毛泽东、周恩来、张闻天、博古的声势，仍然起到了很大的煽动作用。会议通过的《阿坝会议决定》中写道：“目前的革命形势是革命正处于两个高潮之间的低潮时期，党的任务是组织好革命有秩序的总退却。可是，现在还有人要同国民党搞什么统一战线，北上抗日，那纯粹是小资产阶级的幻想，实际上是逃跑主义。当前我们的任务，应该是利用川

<sup>①</sup> 余洪远：“南下是没有出路的！”——回忆敬爱的朱总司令》，出自《红旗飘飘》第21卷，中国青年出版社1981年版，第18~19页。

<sup>②</sup> 《康克清回忆录》，解放军出版社1993年版，第172页。

康边少数民族和有利地形条件，建立川康革命根据地，准备迎接新的革命高潮的到来。”《决定》还颠倒是非，诬蔑党中央坚持北上抗日的正确路线为“右倾机会主义的逃跑路线”，是“破坏红军的指挥系统”，“破坏主力红军的团结”，而把自己的向南逃跑路线美化为“进攻路线”。同时，张国焘为贯彻其分裂主义，压制不同意见，还扬言要对“经过斗争和教育仍不转变的分子”给予“纪律制裁”。接着，便大肆围攻、迫害、逮捕、杀害拥护中央正确路线的干部。

阿坝会议后，张国焘继续利用各种场合攻击党中央，鼓吹“只有南下才是真正的进攻路线”。他和他的追随者给朱德施加压力，甚至谩骂朱德是“老糊涂”、“老右倾”、“老顽固”。朱德却总是很沉着，任他们怎么斗、怎么骂，他总是一言不发，任尔风吹浪打，总像一艘不沉的“航空母舰”。等对方斗完、骂完，他才不慌不忙地同他们讲道理。其优秀的革命品质正如后来毛泽东赞叹的那样：“度量如海，意志坚如钢！”

有一次，张国焘等人在会上造谣：“他们(指党中央)走的时候，把仓库里的枪支弹药粮食，还有一些伤员，统统放火烧了。”朱德立刻愤然说：“这纯粹是谣言！从井冈山开始，毛泽东同志就主张官兵平等，不准打人骂人、虐待俘虏，红军的俘虏政策就是他亲订的，对俘虏还要宽待，怎么会烧死自己的伤员？过草地干粮还不够，动员大家吃野菜，怎么会把粮食烧掉？这种无中生有的谣言，是别有用心的人制造出来的！”一番话，义正词严，驳得张国焘面红耳赤，无言以对。<sup>①</sup>

张国焘见朱德和刘伯承非常“顽固”，便将工作重点转向在左路军中的红一方面军部队。一天，张国焘亲自来给红五军团的部队讲话，他既不讲毛儿盖会议的精神，也不讲关于加强红一、四方面军兄弟团结的问题，却大肆攻击毛泽东为首的党中央的北上抗日方针是什么“逃跑主义”，鼓吹南下建立川康根据地才是所谓的“正确路线”。针对许多干部、战士认为，在少数民族地区，言语不通，土地贫瘠，文化落后，无法建立革命根据地，张国焘

<sup>①</sup> 金冲及：《朱德传》，中央文献出版社2000年版，第451页。

指着他背后喇嘛庙经幡上的一些藏文经符，唾沫横飞地叫嚷：“有的人说，这里缺少文化，难道这些不是文化吗？这些不是文化是什么呢？你们自以为文化高的，那就念给我听听，上面写些什么？”他还恶毒攻击左路军中戴小八角军帽的红一方面军部队是“尖脑袋”，是“机会主义”，叫嚣要肃清他们脑袋里的“机会主义思想”。<sup>①</sup>

张国焘在加紧攻击党中央北上路线的同时，开始进行南下政治动员。1935年9月15日，张国焘以“中国工农红军总政治部”的名义发布了《大举南进政治保障计划》。

《计划》声称：“只有大举南进，消灭川敌残部，才是真正的进攻路线，才是真正的配合全国红军的行动。”<sup>②</sup>《计划》颠倒是非，继续恶意攻击党中央的北进路线，大肆颂扬南下路线，说什么“北进是显然不利的”。“我们南进，当前的敌人是川敌残部，过去都被主力红军打垮过，火力差，士气低落，战斗力薄弱，这使我们能顺利地消灭川敌残部。在南进地区内，人口稠密，好扩大红军，物产丰富，可充实红军物质上的供给，这就使我们能够顺利地在广大地区内建立巩固的根据地，准备我们的力量来消灭蒋介石主力。”张国焘鼓吹“首先赤化全川，这是消灭蒋介石主力、赤化川陕甘的先决条件”。<sup>③</sup>

张国焘在若干年后对其南下行动的决策过程作了文过饰非的解释，与南下政治动员令截然不同地声称南下是为了北上。他说：

我们继续获得消息，证实那时北进是很不利的。敌方已知毛泽东等所率的北上先遣队，只是红军的一小部分，判定我军大部分仍将继续北进，因此，敌方正调集军队，驰至川甘边境各要路截击，企图将我军截为两段，使之不能衔接，然后分别予以歼灭，而敌人的主要力量，又是用来对付我们这方面的。同时，我们的南面，敌

① 欧阳毅：《朱总司令和我们在一起》，出自《回顾长征》，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678页。

② 中国工农红军第四方面军战史编辑委员会：《中国工农红军第四方面军战史资料选编》（长征时期），解放军出版社1992年版，第223页。

③ 同上。

军有些已经调离，绝未猜测我们会乘机南下。这时已是八月（其实，当时已是九月），瞬息秋凉，北进又会发生战士服装缺乏的问题。

我们于是决定暂行南下，我们的计划是：乘敌不备，南下成都西面的天全、芦山一带地区，在那里补充冬季服装，在不利的情况下，我们也可以缩回西康藏族地区过冬。我们觉得就当时的情况来说，这是一个较好的做法；而且这是一个大规模的行动，既可以将敌人的注意力吸引到我们这一方面来，因而减轻对北上先遣队的压力，也可以造成明年春夏之交我军北向的机会。<sup>①</sup>

在南下政治动员令发布两天后，张国焘正式发布了南下军事命令，针对红四方面军广大四川籍战士饮食的特点，提出了颇有吸引力的口号：“大举南下，打到成都吃大米。”他命令右路军中的4军和30军从巴西地区南返至卓克基、马尔康、松岗一带；左路军中的红四方面军部队和原红一方面军的第5、9军及军委纵队一部，从阿坝地区南下，回到马塘、松岗、党坝一带。

接此命令，1935年9月中旬，左路军全部、右路军红四方面军将士，分别从阿坝和包座、班佑地区南下，向大金川流域的马塘、松岗、党坝一带集结。徐向前和陈昌浩率右路军的4军、30军及红军大学部分人员，被迫掉头再次穿越草地。

第二次穿越草地，已是中秋时节，黄草漫漫，寒气凛冽，弥漫着秋天的肃杀气氛。面对浩渺沉寂的大草原，红四方面军许多将士怎么也不明白，我们为什么不跟中央红军北上？为什么又要经过草地南下？难道以前所提的“赤化川陕甘”口号是一纸空文？他们就是带着这些疑问又一次踏进了“人间禁地”。

红军第一次过草地时留下的行军、宿营痕迹仍依稀可见，有些用树枝搭成的“人”字棚里，还堆着一些未能掩埋的红军尸体。衣衫单薄的红军指战员，顶风雨，踏泥沼，熬饥寒，再次同草地的恶劣自然环境搏斗，又有一批

<sup>①</sup> 张国焘：《我的回忆》（第3册），现代史料编刊社1981年版，第270~271页。

同志献出了宝贵生命。看着刚刚倒下去的战友的遗体，再看看第一次过草地时战友的遗骨，将士们不禁百感交集，心痛不已。

徐向前、陈昌浩率部抵达毛儿盖稍作休息后，旋即沿着黑水、芦花以西的羊肠山路，向党坝、松岗开进。当时正是苹果、核桃、柿子收获的季节，部队沿途找来藏民购买或交换，以充饥果腹。到9月底，红30军、4军在大金川北端的党坝同左路军会合。在这里，徐向前、陈昌浩与朱德、张国焘、刘伯承、王树声等人再度会面。徐向前见到朱德时，只见其面色黧黑，目光炯炯，步履稳健，有说有笑，一如既往，似乎天塌下来，也不放在心上。或许是受到朱德情绪的影响，南下路上一直心情压抑、不愿说话的徐向前，顿时心情轻松了许多。

10月5日，张国焘在卓木碉（今马尔康县脚木足）的一座喇嘛庙里召开高级干部会议，出席会议的有朱德、张国焘、徐向前、陈昌浩、刘伯承、王树声、周纯全、李卓然、罗炳辉、余天云等军以上干部，大约四五十人。在这次会上，张国焘的野心完全暴露出来了，他居然宣布另立“中央”，公开打出了分裂主义的旗帜。

会议由张国焘主持并首先发言，他全盘否定中央的政治路线和军事路线。他强调指出：中央没有粉碎敌人的第五次“围剿”，实行战略退却，不单是军事路线出了问题，政治路线也出现了问题。红一、四方面军的会合，终止了这种退却，但中央拒不承认其所犯的错误，反而无端指责红四方面军。南下是终止退却的战略反攻，是进攻路线，而中央领导人被蒋介石的飞机、大炮吓破了胆，对革命前途丧失了信心，于是才奉行继续其北上的右倾逃跑主义路线，直至发展到私自率红1、3军秘密出走，这是分裂红军的最大罪恶行为。他攻击党中央领导人是什么吹牛皮的大家，是“左”倾空谈主义。他还攻击中央领导人，说他们是因为有篮球打、有馆子进、有捷报看、有香烟抽、有人伺候才来参加革命的，一旦革命遇到困难，就要悲观，就要逃跑，等等。

恶意攻击完党中央领导人后，张国焘突然宣布另立“中央”！蓄谋已久

的阴谋终于和盘托出了，张国焘终于撕下了最后一层假面具，露出了“庐山真面目”！他分裂党、分裂红军的活动，终于发展到了登峰造极的地步。

张国焘在会上，宣布中央已经“威信扫地”，“失去领导全党的资格”，提倡仿效列宁和第二国际决裂的办法，组成新的“临时中央”，要大家表态。

另立“中央”的事，来得这么突然，人们都愣住了。就连南下以来，一路上对中央大发议论的陈昌浩，似乎也毫无思想准备，没有立即发言表态支持张国焘。会场的气氛既紧张又沉闷，谁都不想开头一“炮”。张国焘于是先指定红一方面军的一位军职干部发言。这位同志在长征途中，一直对中央领导有意见，列举了一些具体事例，讲得很激动。红四方面军的同志闻所未闻，不禁为之哗然。张国焘的话具有很大的欺骗性和煽动性，特别是对红四方面军高级干部来说更是如此，由于他们不了解内情，张国焘所说的话尽管是颠倒黑白，仍然蛊惑了相当一部分红军将士，加上中央红军长征初期存在着右倾逃跑主义。因而，你一言，我一语，责备和埋怨中央的气氛，竟然一时达到了高潮。

张国焘得意扬扬，要朱德表态。朱德语重心长地说：“大敌当前，要讲团结嘛！天下红军是一家。中国工农红军在党中央统一领导下，是个整体。”“不论发生多大的事，都是红军内部的问题，大家要冷静。要找出解决办法来，可不能叫蒋介石看我们的热闹！”张国焘又让刘伯承表态。刘伯承讲了一通革命形势相当困难的话，表示大家要讲团结，不能搞分裂。徐向前对眼前发生的一切，既不理解，又很痛心。既没有发言，也没有举手表决。<sup>①</sup>

张国焘见主要领导人都不支持他，脸色阴沉，但不便发作。接着，他就宣布了“临时中央”的名单，盗用多数通过的名义，形成了“决议”。张国焘还宣布开除毛泽东、周恩来、张闻天、博古的党籍。“临时中央”主席，自然由他担任。这样，张国焘一手遮天的反党行为，就发展到了顶峰。

为了使其“组织决议”便于通过，同时表明其“广泛性”，除了把党中央多数领导人排除在“临时中央”以外，张国焘将红一、二、四方面军和各

<sup>①</sup> 徐向前：《历史的回顾》（中），解放军出版社1984年版，第459~460页。